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中国人均GDP 1000美元的前夜

一名新闻记者的历史记录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新闻界

中国人均GDP1000美元的前夜

一名新闻记者的历史记录

吴锦才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均 GDP1000 美元的前夜:一名新闻记者的历史记录/吴锦才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1. 9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ISBN 978—7—101—07866—4

I. 中… II. 吴…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②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4②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7157 号

-
- | | |
|-------|---|
| 书 名 | 中国人均 GDP1000 美元的前夜
——一名新闻记者的历史记录 |
| 著 者 | 吴锦才 |
| 丛 书 名 |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 |
| 责任编辑 | 高 天 |
| 装帧设计 | 毛 淳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¼ 插页 4 字数 294 千字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7866—4 |
| 定 价 | 56.00 元 |
-

出版说明

实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推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实施这一工程，旨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一流的思想理论家、一流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一流的出版家、一流的作家艺术家。为集中展示“四个一批”人才的优秀成果，发挥其示范引导作用，“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文库》主要收集出版“四个一批”人才的代表作，包括理论专著论文、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等。按照精益求精、分步实施的原则，《文库》将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陆续出版。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8年12月



吴锦才

1962年9月生，江苏句容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新华社副总编辑、高级记者，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公司（CNC）董事长，新华电视亚太台公司董事长。主要著作有《爱与恨：一个时代的倒影》、《1978—1992 中国沉思录》、《决定中国方向的新因素》、《中国改革：黄金时间·阳光地带》、《生态：家园故事》、《怎样当新闻记者》等。采写有《关于股市的通信》等重要报道，其中《水水水》1986年获全国新闻奖一等奖。1985年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1995年被评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十佳青年”，2000年获第四届范长江新闻奖。是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序

人均 GDP1000 美元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段落。这个财富之坎,曾经是一个长期贫困的国度的人民心中遥不可及的梦想。

1983 年初的邓小平,心中对这个梦想是有过描述的。他在视察江苏、浙江、上海这几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后说:

现在,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 800 美元。我问江苏的同志,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他们说,在这样的水平上,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 20 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

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

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

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

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按照统计数据,中国 2003 年人均 GDP 达到 1090 美元。按照国际经验,进入这个阶段,意味着中国脱离低收入国家群体,国民物质生活、社会状态、文化追求、民主意识等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剧烈的变革。中国的改革时代要延续相当长的时期;而且,进入人均 GDP1000 美元后阶段的社会复杂程度将远

基于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的改革开放岁月。社会的共识是,这一时期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阶段。

实际上,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又实现了从人均 GDP1000 美元至 4000 美元的跨越。中国人均 GDP 于 2008 年超过 3000 美元,于 2010 年超过 4000 美元。这一步跨得更大。但是,人们按惯例所认识的平稳发展期并不会很快到来。我们离全球平均 GDP8000 美元水平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走进每一段长河,你所感受到的水流,都是上一河段传递下来的。人类社会的一切,都会是在承继和传扬中产生的。在新的财富积累年代,必然对上一个 10 年、上一个 20 年、上一个 30 年许多事物和现象有所承续。人们应该永远记住中国的改革开放岁月最初的那些年里,中国所迸发出的勇气和创造力。正因为这一认识,我把中国进入人均 GDP1000 美元阶段之前年份的一些记录,集中在这里做一系统重温,希望能够对认识今天的社会经济现象和态势有所助益。

本书中的文稿均选自我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1979—1992 中国沉思录》、《决定中国方向的新因素》、《中国改革·黄金时间·阳光地带》、《生态:家园故事》等书,这次收入本文库,从内容的系统性角度做了一些章节顺序的调整,对原文中过多的小标题做了删除,文字除了个别时序订正外则没有做大的修改。文中所写的,是中国在进入人均 GDP1000 美元之前的年代的事实,基本上保留了当时的叙述语态;同时,为便于读者理解中国进入人均 GDP1000 美元、乃至进入人均 GDP3000 美元、4000 美元的阶段后所发生的一些新情况,在每篇文末简略加写了一些新的事实和数据。

在此,特向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印本文库表示衷心感谢,向中华书局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序	(1)
改革前记	(1)
第一章 富国新方向	(13)
一、新世纪的光荣与梦想	(13)
二、大风起兮	(21)
三、向世界敞开国门	(28)
四、追求物质文明	(37)
五、选择市场经济	(50)
第二章 改革关节点	(63)
一、大海边,大特区,小特区	(63)
二、从“复关”到 WTO	(69)
三、地利决定了什么	(78)
四、放权与政府之手	(91)
五、分税制:调整贫富关系	(101)
六、市场? 计划? 谁来为腐败担责任	(116)
第三章 发展突破口	(122)
一、中国:要不要林立的公司	(122)
二、私人经济,一条跃动的龙	(132)

三、百姓的储蓄文章	(140)
四、中国股市里里外外	(144)
五、银行怎样成为卖钱的商店	(150)
六、产权变易,面对亿万财产	(162)
七、住房重负下的生存之道	(170)
 第四章 社会警醒时	 (180)
一、爱的秩序	(180)
二、人情经济	(188)
三、“宰人”现象:经济道德的一个聚光点	(198)
四、钱与权的等式与不等式	(203)
五、小道消息	(208)
六、数字疑云	(212)
 第五章 家园紧要处	 (222)
一、环境对中国人口的承载力	(222)
二、灾荒与国情	(234)
三、海陆空的资源争夺	(239)
四、与发展相伴生的公害	(271)
五、环境与钱	(295)

改革前记

有一个对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发生规律的分析认为,中国只要有几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发展的时间,就能够发展起一个“太平盛世”。

但是,这样的时间并不是轻易得之的。我们的民族经历了难以胜数的内乱、外侵、灾害等等,真正留下发展和积累物质文明的时间并不充裕。现实往往重复着“否极泰来”这条规律——当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结构面临崩溃的时刻,出现新的生机。

当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浩劫结束之时,改革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改革至今的30多年,创造出中国史上一段难得的和平发展阶段。从历史的镜头里回望,改革前的曲折,应该让我们对现实有所感悟,对未来有所期待……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公布的中国人口总数是一个统计得很细致的数字:四万万七千五百万。

地球上的中国人,本来远远不止这些。

这时候的毛泽东,心中明显强烈地牢记着死去了的众多中国人。他在整个50年代的思考和谈话中,都时时流露出对活着的人的珍惜。

他也为能统领如此之多的人群而骄傲。有一次在莫斯科开共产党首脑会议,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与毛泽东议论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格局时,毛有如此惊人的出语:就是整个意大利都没有了,中国至少还可以有3亿人足够世界繁衍生息。

这时的世界格局,确实无法不令人时时感觉到战争的阴影。

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就显得格外宝贵。

这同时又是 4 亿多张嘴。衣和食,两项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压在中国共产党的肩头。

这 4 亿多张嘴,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养活。首先需释放的生产力,自然是在土地上生生灭灭的农民。

这时,在中国的土地上,确实只有靠一双双勤劳的手挖出粮食、种出棉花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这种耕耘,几乎都是最原始的人力投入。中国人很快就显示出人多的优势。

这时的中国人,甚至在每一个领域都可以靠人力的积累创造奇迹。

接二连三来到的治黄、治淮、治辽……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几乎都是依靠肩挑土方、人推小车让肆虐的水驯服下来的。

治水的投入,至今还都主要依靠人力的调遣。修水库修到 70 年代末时,农民都是出力不出钱的股东。

“人海”战术即使不直接为工业所用,也至少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铺垫。众多的农业人口和农村市场,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支点。

农业为工业提供主要的粮食和原材料。据测算,农产品作为轻工业的原料的比重,1952 年高达 87.5%,到 1984 年也只降到 68.1%。

中国的工业产品的出路也是主要地流向农村。在农村,商品的销售量一直占全国市场的一半以上。这种商品回流的关系中,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秘密,这就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详细讲到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低廉的农产品与附加值较高的工业产品之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工业利益与农民利益的不均衡。

农民们显得比其他人更穷,农民要依靠多生男丁,一点点地积累起财富。人民公社也普遍地实行了“增加一个人口,分得一份基本口粮”的政策。

从内到外,增加人口的动力都很大。

1949 年到 1980 年,农村人口由 4.8 亿增加到将近 8 亿。农村生育势头难以遏止,甚至一直到今天,也是计划生育最难实施的部分。

雄心勃勃的新中国规划者们,也设想把“人海”战术这个劳动密集型的办

法搬到工业项目的建设上来。

人多一定是优势吗？

在生产方式相对先进的工业项目上，人多的优势走向了反面。

50年代末遍地砸锅炼钢来凑满中共中央号召的1070万吨钢的指标的狂热，在山头上、在院内留下了一炉炉莫名其妙的金属混合物。

在这个环节中，投入的人越多，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大。

可惜的是，当时没有多少人能敏锐地觉察到在这一链条中人的价值的作废。落后的生产方式一遇到自然和人工带来的危机，人们马上就遭逢巨大的生存难关。

对“大跃进”的报复很快来到。

60年代初，自然灾害和连续的政策失误使农业歉收。原本可以凭劳动供养一两个城市人口的农村劳动力，这时往往连自己也需要国家救济，靠别的社会成员来供养了。

生活大滑坡直接影响到举国上下，领袖人物毛泽东甚至也决定三年不吃猪肉。

这种举动当然主要是为了表现出一种表率作用，但这更是在全国城乡出现1500万饥民背景下作出的表率。

三年困难，使中国人雄心勃勃地由生存向发展飞跃的进程急转直下。

中国人重新面对饥饿、寒冷和死亡的威胁。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被打断了。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弊端特别是其与众多人口的矛盾，突出地显现出来。

1959年，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不得不做出布置：全国劳动力必须进一步地合理安排，把工业生产和建设中的多余劳动力继续尽可能地调回农村……

这时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人力富余和生产手段落后之间的巨大冲突。

这中间是什么阻挡了人们的眼睛？马寅初几年前在《新人口论》中就已提到的资金积累不够快的因素，很难被代入“人多要吃饭”的行政管理公式中。

由于缺少资金，大量落后的旧机器一直咿咿呀呀地在中国转动，围绕着

它们的,是大量无法提高效率的工人。

一种习惯了的人力安排方式。

1985 年重庆钢铁公司才从轧钢生产线上拆下了一台 1886 年英制的蒸汽机。它们一直被修修补补地使用在生产上,而当时先进的电动机已经问世,二者的消耗值是 550.6 万元:147.9 万元。但是改机的投入是 1575 万元,相当于新式机器 4 年内节能省下的钱。

在福建永安县的水溪上,我 1989 年还看到过有一台 40 年代留下的发电机。为什么不更换新的机器?回答是:反正也要不了多少电,凑合着用吧!

人越多,资金的需要量也越多,而资金的来源也就愈困难。

马寅初指出: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业装备上要支出 1 万元上下。一般人往往不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

马寅初这一番道理,其中讲的就是一种差别:国家负担着孩子“发展”的责任,而家庭更多地只负担着孩子“生存”的责任。

资金短缺与人口的关系,确实是一个让人不易察觉的问题。

就这样,越缺钱,就越有必要让较多的人集聚在落后的生产手段上,把一锅锅已经很稀薄的饭再加上点水匀给更多的人来吃。

中国人的肚皮似乎都有一种奇特的伸缩功能。毛泽东曾对百姓吃饭的标准做过指示:“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瓜菜、番薯……”这段名言曾经在许多地方被印制在城市居民一家一册的“购粮本”上。

但是领袖自己也很难严格地遵循这个过于低档的生存标准。为了繁重的对大事情的思考,为了每日不断的伏案工作,他也常常对警卫战士念叨说要吃点红烧肉“补补脑子”。

一碗红烧肉远远不是一种奢侈。但是,中国共产党面前却有成亿的吃不上红烧肉的黎民百姓。

甚至在 50 年代末,中国农村广泛兴办公共食堂,最初也只是出于让人们吃饱饭这个善良的动机。

50 年代,据说毛泽东时常念叨起农民们的吃食: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窝头! 不应该……”

有时他也为农民们设想了较理想的饭食。他敲着装着红糙米和小米的饭碗曾经说：“全国农民如果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

也有一次他在专列上突发奇想：“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

后来的实践证明让农民广泛地吃上红烧肉不是一件易事。让几亿农民种出足够的粮食来，也不是易事。一切原因似乎都在于中国的人口。

战争机器杀不绝的人多的优势，转瞬之间就成了人们相互之间彼此影响生存的最主要原因。

中国这艘巨船明显超载了。就在这时，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两项工作几乎同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

计划生育、保护资源，两项工作差不多在同时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这是中国人的背水一战！

到70年代末，许多地方的中国人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土地和气候条件都极适宜农业耕作的安徽省凤阳县，农民们还时时会记挂着吃饭、穿衣两件大事。

出了名的“凤阳花鼓”在几百年前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70年代的花鼓唱的主题还是那一套：“凤阳地多不打粮，碾子一住就逃荒，只见凤阳女出嫁，不见新娘进凤阳。”

在一个小村——小岗，吃不上饭的村民们终于不堪忍受。庄稼人为什么得靠讨饭度日呢？饿死是个死，换个干法干死也是个死，为什么不换个干法？

在这种逼上梁山式的愤懑情绪下，小岗村人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事业迈出了第一步。一张包干到户的契约悄悄地写下，十几个庄稼人的手印和图章隆重地按下，饥寒交迫的农民终于大胆地起来改革不合理的政策了。

现在已被华贵地置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览玻璃柜中的这一份契约，实际上也是农民们与地球签下的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的目标当然不仅仅在于吃饱饭。

农民心中还有着过几天好日子的憧憬。

这是一个正当的人生主题。党中央也明智地响应了人民的期望。1978

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新的口号：城乡人民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

这个口号也给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提出了新的空前的压力。

中国人的思想顿时解放，眼界也一下子开朗，对物质欲望的胃口，更是豁然大开。

在优良的政策面前，10 亿人吃饱饭的问题很快就不在话下：1982 年和 1984 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连续登上 701 斤和 792 斤两个台阶。

棉花的自产量也能满足市场。1984 年中国由棉花进口国一变而为棉花出口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棉花进口历史宣告结束。

生活中的变化悄然发生。

手表、卷烟、猪肉、鞋、肥皂、保温瓶等在 1983 年以前还只为城镇居民所普遍享有；而很快，它们在农村一部分地区也成为必需的了。经济学家当即就敏锐地从收入水平、收入结构、营养素摄入水平、消费支出构成、必需品消费比重等方面发现：我国从 1982 年前后开始越过以吃饱穿暖为主要内容的必需品消费阶段，进入了超必需品消费阶段。

10 多亿人口的一个大国，迅速地跨入这个令人满足的新阶段，给整个经济的宏观调节带来了新的题目。

以成亿人走向富裕作为经济“龙头”，人口、粮食、土地等一系列生产和消费的要害都要进行新的组合。

富裕是无止境的。富裕的人们还出现了一个以投资、增值为要求的新的经济欲望。

以中国之大，再菲薄的收入积聚起来，也马上会成为空前可观的巨大财富。

不过几年时间里，中国人的储蓄、债券、股票等各种金融资产已经有 15000 亿元人民币之多。

1988 年夏天，这些资产中仅仅有区区几百亿元涌向柜台，就马上掀动起一个惊动朝野的“大抢购”来。

巨大的消费欲望，把中国经济改造成了一个必须快速发展的经济。

在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度，发展的经济显然比一心为温饱而孜孜运转的经

济更复杂、更难以驾驭。

温饱的欲望、享受的欲望、金钱增值的欲望，汇集在一起，就只有一条出路：向这个地球更多地索取。

索取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那种以旧生产方式机械扩张的索取。

人多的中国，就面临着这个新的消耗格局。开煤窑，办工厂，从最简单的小作坊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自动化流水线……经济的轮子，为了人们最迫切的需要，隆隆地飞速转动。

大自然的潜力，依然没有从深度得到全面利用。大量重要的资源往往还在沉睡之中就被废弃，而人口居高不下之势，与它一映衬，巨大的矛盾就更汹涌地凸现在共产党人面前。

在有限的生产力面前，只有投入响当当的金钱，才能收获到最快最多的成果。政府开始调节“吃饭”和“建设”两部分资金的比例。

长期以来被当作为千秋万代增加后劲着想的“高积累”政策，在科学的正视之下悄然变化。

粮食，仍是最为关键的国情基础。一批权威人士指出：我国粮食生产的净商品率只有 15% 左右，按每年生产粮食 6500 亿斤计算，商品粮约为 1000 亿斤，以这些粮食供应近 1.6 亿非农业人口和工业等方面的用粮，肯定是不够的。

工业生产技术装备的落后，也被正视。

而接下来自然而然的一个结论是：我国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国民收入，除了用于满足 10 亿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费以外，能够作为积累用于经济建设的部分是很有有限的。

这个“有限”的理论，就在激昂的发展的主题之上，加上了一个审慎的、缓进的限制。

也确实没有了说大话、放大炮的余地。

一个好的政策必然是尊重科学的。

改革的最核心精髓是实事求是。

科学的数据统计、客观的国情认识，在一种思想空前解放的动力之下，把人均概念接二连三地告知人们。人均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人均负担的危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开始认识:中国“地大物博”的事实一直在被“人口众多”这个事实所抵消。大与小发生奇异的倒置:集合的大国,人均的小国、穷国,形成一种对比强烈的景象:

人均国民产值:世界倒数第 25 位;

人均矿产资源:世界第 80 位;

人均水资源:世界第 88 位;

人均耕地:世界第 67 位;

人均森林:世界第 120 位……

一个个的人均数据,都居于世界人均水平线之下。中国人正在鼓足风帆的时候,资源危机却一下子如此清晰地出现在面前:缺水,沙漠化,灾害频仍,砍林、毁草风波不断,工业废水、废气、废渣向四处倾卸……

尽管工业、农业的生产对大自然的开发都在时时报捷,但是,具有了新的知识结构的国家经济决策层并不能因此陶醉。

相反,这节节增长的产量给清醒的人带来的是更大的担忧:

据中国环境科学院估计,我国每年因为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 500 亿元!

专家提醒人们:当我们还来不及欢庆第二个胜利成果时,自然界就常常把第一个成果取消了,使我们的民族陷于更为狭小的生存空间、更加脆弱的生存基础。

人口、粮食、土地、资源、环境……这一系列消耗与供给的矛盾,忽而此因彼果,忽而此果彼因,交织在一起,困扰着人们。

在众多人口的发展压力下,决策者们懂得了向资源要进步是唯一的選擇。

路径有时很多、很多:

广东有 140 万人被容纳在从香港转移过来的来料加工业。田野上的普通人,在这场国际性的转移中每年可以获得 4.3 亿美元的工缴费收入。

乡镇企业轰然崛起。农民们惊喜地发现,衣食并不一定只有从土地里才能觅得。灵巧的双手、智慧的脑瓜子,换来的是更有诱惑力的利润。

直接挖掘自然资源而不是多层次地合理利用资源,只能让人们获得最初的报偿。每吨土焦盈利 20 元,每吨机焦可赚 100 元,而山西乡镇小煤窑却在